

论美国的解构主义批评

崔雅萍

(西北大学 外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原先的一些著名结构主义者对结构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产生怀疑,采取了与结构主义大相径庭的理论方法来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对结构主义进行批判、否定,从而促成了结构主义的衰落和后结构主义的崛起。在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中,最突出的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解构理论是1966年由德里达传到美国的,许多美国著名理论批评家很快就接受了他的解构理论并使之成为本世纪对美国文学及美国文学批评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一种理论思潮。他们不仅接受德里达的理论,而且还对这一理论有所发展和创造。他们在实践中各自恪守自己的原则,并开创出自己的一套批评术语和独特的领域,其中的德曼还逐渐在解构理论批评界和德里达具有同样的权威性。

关键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2)02-0124-04

在西方各国,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外,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学者们如今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后主义理论”了,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等,本文所涉及的是其中的一种,即“后结构主义理论”。首先,结构主义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按照美国文学批评家罗伯特·斯各尔斯(Robert Scholes)的观点,结构主义是20世纪人类思维、观察及研究客观世界的一种模式,是人们看待外部事物的原则或具体方式[1](P167)。但是,结构主义在观察事物或阅读文本时总是拘泥于一个固定的结构中,并总是竭力使自己对事物的分析和所做的结论也符合这个结构中的各个规则。60年代后期,由于结构主义的科学性、刻板性和客观性已不能适应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它的僵化和一成不变引起了结构主义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另外,原先一些声名显赫的结构主义者迈克尔·福科(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等对结构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产生怀疑,对自己以前的信

念进行否定,采取了与结构主义大相径庭的理论方法来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拆散”结构,并对结构主义进行批判,“在形而上的领域里对结构主义进行了一次自我否定的革命”[1](P166),从而促成了结构主义的衰落和后结构主义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是由结构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有人认为,后结构主义仅仅是结构主义含义更全面的详述,这种阐述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和思维方法最初发端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曾动摇了存在主义的主体意识体系,并以更为客观的方式来看待世界[1](P167)。而后结构主义试图减低结构主义的科学性,并向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乃至整个科学主义思潮挑战。福科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对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二元性的挑战。他提出了“话语”说,并针对结构主义的模式提出自己的松散构形设想[1](P173)。德里达所反对的是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中的“词语中心主义”(logocentrism)[2](P171)。他认为,对语言的解读是无止境的。他的理论从另一个角度对结构主义的“严谨的”、“科学的”、“整体的”、“刻板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进行否定、批判和分解。巴尔特是60年代法国著

收稿日期:2001-04-10

作者简介:崔雅萍(1964-),女,江苏新沂市人,西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美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名的结构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的行为以一种公认的系统为先决条件,这一系统体现着各种有差异的关系。巴尔特把这一原则实际运用于社会实践中去,并把它们解释为“作用于语言模式的符号系统”[2](P156)。任何一种言语都以一个正在使用的系统为先决条件,他认为,语言系统会变化,而这种变化必从“言语”开始。但后来,根据他在《符号学的要素》中的观点,“结构主义方法能够解释所有人类文化的符号系统”[2](P166)。然而,就在同一论著中,他争辩说,结构主义论述本身能够成为解释的对象,并详细阐述理论上的元语言(即他在该论著中所提到的第二序列言语)来描述文本现象[2](P166)。在他的短文《作者的死亡》问世时,他不再以传统的观念认为作者是文本的起源、是文本内容的源泉、是惟一能作权威性解释文本的人。他认为,读者可随意从任何一个角度阅读文本,绝对正确的角度根本不存在。此篇文章标志着巴尔特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到来。而1970年他的《S/Z》出版却表明了他的结构主义理论观念的彻底动摇。他开篇便说,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们试图“在同一结构中看到世界上所有的故事”[6](P5~7),简直是徒劳的奢望,并表现了他对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的怀疑和不满[1](P172~174)。

那么,何为后结构主义?到目前为止,似乎西方的学者们很难对这一概念作出准确的定义。后结构主义是自结构主义衰落而后兴起的各种理论批评思潮的混合体的总称。这些理论思潮的共同点在于“怀疑、反动、否定”结构主义,并从本质上分解结构主义的根基和削弱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体系,主张二元对立的消除,反对任何中心和固定模式。在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中,最突出的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反词语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他认为,在西方语言学理论及各种哲学思想和文化中都有一个中心。在他的经典著作《文字学》中,他把人们对这个中心的需求称作“词语中心主义”。他把“话语先于写作”(即话语比书面语更能表达始发的思想)称为“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并认为“语音中心主义”是“词语中心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2](P170~172)。“词语中心主义”是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中展示的思想,而德里达要消除这个中心,因为,在后结构主义看来,对语言的解读是无止境的,而且解构阅读是多元的,不可终极的。解构主义运动的力量影响了许多其他主要的知识传统,使这些传统被从根本上重新界定。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就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解构》

中对解构哲学和现代马克思主义作了深刻的比较[3](P5)。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符号的追寻:符号学,文学,解构论》在论述符号学和文学的同时也涉及到了解构的理论。接着,他在1983年出版的《论解构主义: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中,对解构的理论作了权威性的概括[4](P80~83)。他认为,“人们对解构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描述:一种哲学观点,一种政治策略和智力策略,以及阅读模式”[1](P176)。尽管如此,解构主义在西方理论批评界仍常常被认为是“令人费解的、自我放纵的和虚无主义的理论”[2](P178~P179)。

二

解构理论是1966年由德里达传到美国的。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讨会上的论文《人文科学中的符号、结构和话语的游戏》在美国理论批评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文中,他对自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的基本玄学假想提出了质疑,同时也对假想中的“中心”进行了抨击。他认为,“结构”的概念甚至在“结构主义”的理论中也总是以某种意义的一个“中心”为先决条件,这个“中心”控制着这个结构,但其本身并不属于结构分析。要找到该中心的结构势必找到另一个中心。他的理论在当时美国理论批评界和大学的人文学科院系中具有相当的影响,许多美国著名理论批评家很快就接受了他的解构理论,并使之成为本世纪对美国文学及美国文学批评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一种理论思潮,解构主义的运动从此在美国的批评界开始展开,德里达自己也于1966年宣讲了那篇论文后便成为美国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并在耶鲁大学的讲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美国的解构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解构理论批评家,其中包括保罗·德曼(Paul de Man)、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等人,其中保罗·德曼的影响最大,成绩也最显著,而且有关解构批评的文章也最多。所以,他一般被认为是美国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

当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讲授解构主义理论时,保罗·德曼是最早的接受者之一,而且受德里达的影响很明显。他发表了两部著作:《盲视与洞见》和《阅读的寓言》精确地阐述了解构批评的理论。他不仅接受德里达的理论,而且还对此有所发展和创造,并有了自己的一套批评术语和自己独特的领域,逐渐在解构理论批评界和德里达具有同样的权威性。

在《盲视与洞见》一书中，德曼围绕着一个悖论进行探讨，即批评家只有通过盲目的经历才能有所洞见[2](P176~177)。他们采取的方式或理论往往与其所产生的洞见不一致：“所有这些批评家似乎终究会说，某些东西总与他们所说的意义不同。”[2](P177)他们之所以能够达到洞见的境界只是因为批评家们在从事批评实践时，往往受到某种特殊盲目性的支配，而他们一旦处于这种支配下，就有可能获得这种盲目中的洞见。德曼认为，这种盲目中的洞见是由一种统一转向另一种统一所促成的，这种统一并非存在于文本中，而是存在于阐释的过程中，而且，这种转向是无意识的。在《阅读的寓言》中，德曼扩展了他在《盲视与洞见》一书中已经论述过的“修辞型”的解构批评。“修辞手法”是劝诫性文学的一个经典性术语，德曼很关注修辞理论的作用，他认为，“比喻手法”使作家“说一件事情却意指另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以一种符号代替另一种符号，即“隐喻”，以一连串符号中的一个来取代意义，即“转喻”[2](P177~178)。实际上，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就是一个修辞性的解读过程。按照德曼的观点，“隐喻”成了一个盲目的转喻。德曼表明，正如批评的洞见产生于批评的盲目性一样，文学批评依赖于用于其中压制性使用的修辞含义中。德曼把自己的解构理论基于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上，他认为，是语言和修辞的效果阻碍了对真实的直接表达。根据他的理论，语言从根本上来讲是修辞性的，而非表达性的。非修辞性的语言根本不存在。德曼把这些论辩运用于批评本身中去。在他看来，阅读必定是“误读”，因为“修辞”不可避免地要干预批评和文学文本[2](P177~P178)。

哈罗德·布鲁姆在美国的解构批评中对修辞手法的使用更为精确、出色。他虽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但并不像德曼那样极其专注于文本，不过，他仍然认为文学是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然而，他大胆地把修辞的理论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犹太教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他认为弥尔顿是第一个“主观性的诗人”，他说，自从弥尔顿和他的不朽诗篇《失乐园》以来，诗人们经受着一种“过时”意识的折磨，即由于自己在诗歌史上是后来者，他们害怕自己的前辈诗歌大师们早已把所有的灵感都使用殆尽。为了在“过时”的情况下进行写作，诗人们必须进入一种心灵的世界进行奋斗，来创造一种富于想象力的空间，这就需要他们去误读(misread)他们的前辈大师们的作品，以期创造出一种新的阐释[2](P173)。他的这些

观点在他《误读的地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特别对华兹华斯、雪莱、济慈和丁尼生的浪漫主义“危机诗歌”感兴趣，他认为，上述这几位诗人都力图创造性地去误读自己的前辈大师。他们的每一首诗都经过了“修正”的各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表现出修正的程度。“比喻”和“论辩”是“修正”可交替的形式。他将所说的“比喻”，即“修辞法”列为6种：反语法、提喻法、转喻、隐喻、夸张法以及再提喻法。与德曼不同的是，在他的著作中，修辞并非是最有特权的方法，因此，称他的理论方法为“心理批评”可能会更精确些。

希利斯·米勒在60年代深受“日内瓦学派”的“现象学”批评的影响。70年代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小说解构批评理论的分析评论文章及论著，其中最能显示他的理论成果的是1982年出版的《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1970年，在一篇论述狄更斯小说的文章中，他采用了雅格布森有关隐喻和转喻的理论来进行阐述。他认为，《博兹的速写》中体现的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模仿的效果”，而是用修辞手段进行描写的效果。看着MONMOUTH大街，博兹看到了“各类事物、人工制品、街道、建筑物、车辆、商店里的旧衣物”[2](P182~183)。从转喻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表示某些虚无的东西，他从这些东西中推论出他们的生活。然而，米勒的描述没有停止在这种对现实主义小说的相对结构主义的分析上，他描述了这种转喻的 dead 人的衣服如何在博兹想象的没有人穿的时候在他的脑海中有了生命：“背心几乎是焦急地要自己穿上自己。”[2](P183)

人和他的环境(房屋、财产等)之间的这种转喻的相互作用“是狄更斯小说中常用的替代暗喻的基础”[2](P183~185)。转喻确定了衣服和穿衣人之间的联系，而暗喻则表示了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米勒实际上分解了雅格布森最初在“现实主义”的转喻和“富有诗意”的隐喻之间所置的对立关系，他对此所作出的“正确的解释”就是“把比喻的东西看作是比喻的东西”[2](P184)来理解。这些分析表明他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理论有不赞同的地方。他强调叙事文本的寓言性，从而说明文本蕴涵的历史性。根据他的论述，叙述的意义总是建立在一个“寓言”式的结构中，即“说一件事时却意指另一件事”[2](P177)，因此，作品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语言结构来展示其意义。1980年，米勒在《今日诗学》杂志上评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地毯上的图案》时强调说，文本在语言形式表面虽然具有完整的

有机体,但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文本本身同时具有“解构意义完整性”的因素[6](P400~401)。这使文本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但另一方面,由于读者的阅读过程是文本以外的符号系统(即社会、历史形成的文化结构)与文本内的语言结构进行交换的过程,因此,文本又是可读的。他认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必须把分析重点从语言表面层次的信息传递模式转移到一个更宽泛的文化交流模式中去。

三

解构主义理论由德里达于1966年传到美国后,由于美国人思想开放,容易接受新事物,因此,它被美国一些著名的批评家接受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深是不足为奇的。美国的批评家不仅接受、推广和运用之,而且还加以创造性地发展这一新的批评理论。但是,美国的解构主义批评家大都由各个不同流派转变而来,他们虽接受并运用解构批评理论,但在实践中又各自恪守自己的原则,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是解构批评在美国的鼓吹者,同时又对解构批评提出不少异议。另外,美国的解构批评还没有摆脱形式主义的轨迹,仍然十分专注于文本,注重结构分析。实际上,解构理论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和方法有其不完善性和矛盾性,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中有些牵强附会[1](P190~193),但它毕竟是一种新兴的理论批评思潮,而且已有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把注意力集中于运用解构的方法进行批评,并且,一些对解构主义进行客观地评介、论述、研究的著作也在美国相继出现。在这些论著中,有的是对后结构主义诸理论思潮对读者及阅读本身的态度进行分析比较;有的则通过对解构主义的奠基人德里达的基本思想进行介绍和评述,详细分析这些思想观点在批评实践中的可

行性和产生的影响;还有的则认为,“解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对差异的追求”[4](P60),在文学批评中,没有绝对的标准、绝对的客观性存在等等。不过,无论是哪种观点,这类评述都较客观,较少激烈褒贬的词语出现。最后要说明的是,解构主义是一种不易理解的哲学理论,而且,其本身也在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况且,把它运用于文学批评中仅仅是近十多年来的事,因此,要对它的价值作一个客观全面的、恰如其分的判断和阐释并非易事,但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它给我们提供的思维角度应该是“全方位的、多元化的”[1](P190),并要求我们在文学批评中既要注重作品的形式结构,更应该理解其深层的意义。另外,有关后结构主义和解构批评的理论问题在中国国内仍处于陆续介绍中,相关的研究也才刚刚开始,或许这种对我们来说全新的理论会给我们的文学批评实践带来某种启示。

参考文献:

- [1] 王宁. 20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2] Selden, Rama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7.
- [3] Ryan, Michael. 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 A Critical Articula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82.
- [4] 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M].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83.
- [5] De Man, Paul.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1.
- [6] 虞建华.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刘欢]

On American Deconstruction

CUI Ya-p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In 1966, at a symposium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Derrida gave his paper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which started a new critical movement, deconstruction critical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oon Derrida won over many of America's most powerful critics, among whom was De Man. He circles around the paradox that critics only achieve insight through a certain blindness. He also develops a 'rhetorical' type texts which seem to depend o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hetoric used in the passages.

Key words: structuralism; poststructuralism; theory of deconstructionism